

李承贵 著

儒学的形态与开展

《儒学的形态与开展》的作者在思考儒学开展方向的过程中，逐渐转入对儒学形态的思考；而在对儒学形态的思考过程中，又发现了儒家「生生」理念。其认为「生生」才是儒家思想的生命和源泉。作者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促进儒学积极健康发展的主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李承贵 著

儒学的形态与开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学的形态与开展 / 李承贵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097 - 9055 - 7

I. ①儒… II. ①李… III. ①儒学 - 研究 IV.
①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6428 号

儒学的形态与开展

著 者 / 李承贵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卫 羚

责任编辑 / 卫 羚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51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055 - 7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言

本书之所以取名“儒学的形态与开展”，因为所编入的论文都程度不同、视角不一地涉及“儒学形态”与“儒学开展”这两大议题。

在“儒学形态”方面，《〈易传〉中的人文智慧与“自然”关系》主要探讨了《易》中人文思想内容与特点，其主要内容有精神品质、道德修养、制度礼仪、行为规范等，而基本特点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就是说，《易》中的人文思想、人文智慧来自中国古代圣哲基于人类实践对大自然“行”与“事”的体悟，进而将此“行”与“事”的内涵转化为人文作品和人文精神。《宋代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主要讨论宋代新儒学中儒佛关系问题，认为宋代新儒学是以儒学为主的学说形态，佛教只是在形式上对宋代新儒学给予了支援与完善，这是从学说结构上分析儒学的形态。《儒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认为儒家思想透显出一种鲜明而顽强的自然主义的特质，且这种自然主义是生命的、生机的、生态的。这是从思想特点上描述儒学的形态。《方东美生态思想及其意蕴》是通过方东美的儒学思想进一步展示儒家思想的自然主义特质，即生态自然主义。《性理与事理：宋明儒与清儒的分界》对宋代儒学与清代儒学的差异进行了初步区分，认为宋代儒学更重精神，清代儒学更重物质。他们都谈“理”，但趣向不同，宋儒由“性”谈“理”，清儒由“气”谈“理”；从而将宋代儒学与清代儒学的形态差异展示出来。《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主要由20世纪学科分化的角度考察、判断儒学的形态，具体呈现为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等。这些儒学形态实际上也是儒学开展的方向，即由宗教、政治、哲学、伦理等角度对儒学的诠释与丰富，既是对儒学的开展，又是形成了相应的儒学形态。《人文儒学：儒学的本体形态》则是寻找儒学的根本形态的尝试，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基本形态，而其他形



态（宗教、政治、哲学、伦理等）都以人文儒学为中心，也由人文儒学而展开。《“人文儒学”何以可能》继续从不同角度对人文儒学合理性进行了深入论证，从学理上阐明人文儒学的可信性、自洽性与价值性。《怎样看儒家思想的普适性》对儒家思想的普世性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认为儒家思想的某些层面、某些要素具有普世性。这是从儒家思想适应时空的角度讨论儒学的形态问题。《生生：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是对儒家思想核心的把握，即如果儒家思想的本体形态是人文儒学，那么人文儒学的核心不是别的，正是“生生”二字。可见，上述文字大体上都是围绕“儒学形态”而展开的思考，但角度各异，路径有别，这也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厚度与多样。

在“儒学开展”方面，《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提出儒学当代开展的方向应该是生活儒学，因为这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儒家思想史的经验，更是当代环境所然。《当代儒学开展的三个向度》认为儒学开展方向除了生活向度之外，还应有批判的向度、信念的向度；忧心儒学学术精神的丧失，怀疑缺失信念的儒学复兴。《高攀龙的佛教观及其儒学本色》是透过高攀龙佛教观考察儒学开展的问题，即儒学在与其他学派的互动中应该怎样发展自身。《论宋儒重构儒学利用佛教的诸种方式》通过宋儒吸收、消化佛教的实践对宋儒在学术理论上开展儒学的努力与方法展开了探讨，总结出宋儒利用佛教发展、增强自身的经验与智慧。《百年来儒学开展方向主要论说及评论》对20世纪关于儒学开展方向的几个代表性主张进行了扼要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需要妥善处理的几个基本关系，即儒学与西学的关系、儒学多极化走向与儒学基本走向的关系、儒学的学术立场与意识形态助力的关系。《儒家思想的当代困境及其化解之道》分析儒学在当代遭遇的困境，并提出了化解困境的方式与手段。《书院能否孵化出大师？》承认书院对传播、传承儒学的特殊作用，但并不认为书院可以代替现代学校在儒学传播、发展中的作用，建议二者的取长补短或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国学研究的三大课题》基于当下国学、儒学宣传与研究中的混乱状况，提出应该注意并遵守的三大课题，即心理准备、方法意识和评估规则。《王国维的儒学范畴诠释及其范式意义》与《儒学的传承与开新——以熊十力释“理”为例》分别考察了王国维与熊十力解释儒学概念的实践与企图，前者通过对儒学范畴

的诠释，丰富了儒学概念和范畴的内涵，后者则通过对儒学范畴的诠释，尝试了开出“新外王”的理论探索。它们属于学术理论上开展儒学的案例。《儒学传道的四种方式》基于儒学史的考察，认为儒学传道有以身传道、以文传道、以事传道、以心传道四种方式，并分析了此四种方式的价值、不足及所蕴含的诸多启示。《当代儒学的四大使命》认为儒学的当代开展必须要做好四件紧要的事情：一是义理的梳理，二是百姓的教化，三社会的批判，四是价值的落实。《百余年来儒学的宗教性诉求及其不同意蕴》简要回顾了20世纪宗教儒学主张的形成、演变之情形，并对其不同意蕴进行了分析，宗教儒学的开展并非一帆风顺。不难看出，如上文字都是围绕“儒学开展”而展开的讨论。它们分别由现实需求、概念诠释、学派互动、载体选择、态度方法等多层面、多角度地探讨了“儒学如何开展”的课题，希望这些探讨对于儒学的未来开展有所启迪有所警醒。

当然，其中也有既涉及儒学形态，又涉及儒学开展的“双重”思考。《孔子君子人格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既对孔子君子人格的内容、特点及不足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孔子君子人格的当代价值展开了评估与展望，肯定了孔子君子人格对于现代人格塑造的特殊价值。《论杨简的儒学观》则对杨简心学形态的儒学进行了呈现，并对其特点及价值做了检讨，认为杨简的心学儒学不仅是儒学史上特殊形态，而且在儒学开展上既有学术上的开新，又有实践上的创新。《颜钧的平实之学》不仅揭示出颜钧儒学思想的“平实”特质，而且将颜钧讲道、传道的方式进行了概括与肯定。《当代儒学流派的基本格局及其走向》对当代儒学的四大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儒学派、自由主义儒学派、保守主义儒学派、理性主义儒学派等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分析了它们的内容，揭示了它们的特点与不足，并对当今儒学的开展提出了期许，主张“理性主义儒学”应该成为当今儒学发展道路的优先选择。《儒家榜样教化论及其当代省察》比较充分地、深入地研究了儒学特别是先秦儒学的教化思想与教化实践，从教化功能角度对儒学的形态展开了论述，从教化实践角度探讨了儒学开展问题。可见，上述文字既讨论了儒学形态问题，又探讨了儒学开展方向问题。

令人惊奇和兴奋的是，在关于“儒学形态与开展”的探索过程中，我之于儒学思考的轨迹也逐渐清晰起来，即从“生活儒学”到“生生之学”。在思考、探讨儒学开展方向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转入对儒学形态的思



考，而对儒学形态的思考过程中，突然发现了深藏于儒家思想底部的“生生”理念。“生生”才是儒家思想的生命，才是儒家思想的源泉！这个脉络由《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2004年）、《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2008年）、《人文儒学：儒学的本体形态》（2009年）、《生生：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2012年）清晰地演绎出来。从另一角度说，我对儒学的思考是从危机意识开始，进而寻找化解危机的方法与路径，最后寻找到儒学可以自行解决困境的核心理念——“生生”。因而也可以说是从外在到内在、从形式到内容的思考过程，更可以说是渐次深入的精神生命体验。从此，“生生”理念成为我思考儒学新的逻辑起点，当然也是终点，因为我们要由“生生”的视角去开掘儒家思想资源，去充实儒家思想内容，去丰富儒家思想的论述，去实现儒家思想的价值，去关怀儒学所要关怀的宇宙生命。孔子提出了“仁”这一充满人性的概念，这是人类的伟大发现之一；二程兄弟体贴出“天理”这一试图将规则与情感融为一体的概念，是对儒学的创造性发展；王阳明悟出“致良知”这一挺立人的主体性的概念，儒学又获得一次重大推进；我觉悟出“生生”这一通身洋溢生命气息的概念，希望能为儒学的发展开辟新的境域！因此说，本书虽是由多篇论文构成，但它有着“一以贯之”的思想精神。贯之者，“生生”也。因而本书是围绕“儒学形态与开展”的思考而形成的以“生生”理念为轴心的有机整体；而且，本书在思考“儒学形态与开展”问题的实践中，努力探寻与儒家思想生命相应的开展路径，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或许有助于儒学健康发展的主张与观念。当然，本书仅仅是作者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关于儒学问题的思考，自然会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或不成熟的表述，或幼稚的思考，或片面的观点，因而还请读者朋友在宽容中不吝指正，以滋润和完善我的思想生命，从而发展和更新儒学的生命。

李承贵

南京仙林道场

2016年1月3日

目 录

- 一 孔子君子人格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 001
- 二 论杨简的儒学观 / 009
- 三 《易传》中的人文智慧与“自然”关系 / 023
- 四 颜钧的平实之学 / 032
- 五 高攀龙的佛教观及其儒学本色 / 048
- 六 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 / 058
- 七 百年来儒学开展方向主要论说及评论 / 064
- 八 宋明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 / 075
- 九 当代儒学开展的三个向度 / 088
- 十 儒家思想的当代困境及其化解之道 / 091
- 十一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 101
- 十二 论宋儒重构儒学利用佛教的诸种方式 / 125
- 十三 儒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 / 141
- 十四 书院能否孵化出大师？ / 152
- 十五 人文儒学：儒学的本体形态 / 155
- 十六 “人文儒学”何以可能 / 175
- 十七 国学研究的三大课题 / 190



- 十八 怎样看儒家思想的普适性 / 205
- 十九 王国维的儒学范畴诠释及其范式意义 / 211
- 二十 儒学的传承与开新
 - 以熊十力释“理”为例 / 223
- 二十一 儒学传道的四种方式 / 240
- 二十二 方东美生态思想及其意蕴 / 248
- 二十三 性理与事理：宋明儒与清儒的分界 / 261
- 二十四 当代儒学流派的基本格局及其走向 / 271
- 二十五 生生：儒家思想的内在维度 / 287
- 二十六 当代儒学的四大使命 / 304
- 二十七 百余年来儒学的宗教性诉求及其不同意蕴 / 312
- 二十八 儒家榜样教化论及其当代省察
 - 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 316

一 孔子君子人格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理想人格追求，但任何一个时代的理想人格在相当意义上可视为此前各时代理想人格普遍价值的积累，特别是塑造理想人格的精神资源。历史从来就是我们的起点。君子，是文化之圣孔子设计的理想人格；但君子人格的内涵及其可能蕴含的普遍意义却少有人论及。本文拟就此问题略抒浅见，愿得到学界前辈及同仁好友的指教。

何为君子？

“君子”在《论语》中出现 107 次之多，杨伯峻先生对“君子”做了两种界定：一是有道德的人，一是在高位的人。^①其实有道德的人不一定在高位，而在高位人也不一定有道德，也就是说，“君子”并非某种具体的“类人”、“阶层”或“集团”。“君子”指称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用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的“驱除法”将“君子”归属某实体的“类”的可能性排除：其一，“君子”不可能是国君。《论语》中“国君”与“君子”从来是分别言的，言国君时只用一“君”字，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召命，不俟驾行矣。”（《论语·乡党》）可见“君子”不同于“国君”。其二，“君子”不是统治阶层的官员，因为有官职之人并不都“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夺也”（《论语·泰伯》）。而这却是孔子对“君子”的一种要求，而且“君子”畏“大人”。所谓“君子畏大人”（《论语·季氏》），显然“君子”不可能是有官职之人。其三，“君子”不是普通老百姓。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 241 页。



姓，因为“君子”有文化方面的要求，所谓“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其四，“君子”也非一般的知识分子群体，因为有“君子儒，小人儒”（《论语·雍也》）的差别。因此可以说，孔子所谓“君子”绝不是任何实体的“类人”。不过它又并非空洞无物。因为其一，“君子”要有才能，是“大能”者，所谓“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论语·卫灵公》）。其二，“君子”应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大德”者，所谓“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其三，“君子”要知识渊博，悉诵六经，是大“智”者，所谓“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其四，君子具有忧患意识，是“大忧”者，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其五，“君子”要有仁者情怀，是“大怀”者，所谓“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也就是说，“君子”在孔子观念中融合了“大能”“大德”“大智”“大忧”“大怀”等多种品格，综合了诸多在孔子看来属优秀品性的人格，因此，“君子”是多才多艺的，而不能与只有一种用途的器皿等观，所谓“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君子人格要素

由前项得知，“君子”实由多种品性构成的人格象征。但这些多种品性的具体内涵即“君子”人格的具体内涵之规定，仍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整理与研究。

（1）“以义为质”。孔子所谓“义”，是与“利”对待者言，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即公正、合理。孔子认为，“义”乃“君子”成为“君子”的基本规定，所谓“君子以义为质”（《论语·卫灵公》）。如是，“义”就成为对“君子人格”之普遍性规定：“君子”之“勇”是“义”之勇，所谓“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论语·阳货》）；“君子”求富贵，以“义”为前提，所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生”与“仁义”之间，“君子”应舍生取“义”，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所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总之，君子行事于天下，无论曲直，“义之与比”（《论语·里仁》）。“义”成为“君子”人格的基本规

定,“以义为质”意味着“君子”是公正的象征。

(2)“关怀意识”。君子要有“以天下乐为一己乐、以天下苦为一己苦”之关怀众生的意识。对先圣之“道”,有继往开来之心,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对民众生命,要有博施济众之情怀,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所谓“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一宇宙,等万民,同苦同乐,这是“君子”人格的又一基本规定,“君子”由此而成为人道的象征。

(3)“中庸不偏”。处事、仪表、气质、为学,“君子”表现出来的风度是“过犹不及”“执两用中”。处事是扣其两端,否则事不成反得害,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仪表要文质相宜、融为一体,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品性是庄重而不骄饰,威严而不癫狂,所谓“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为学是学思并用,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中庸不偏”乃“君子”至德之一,由此“君子”成为着周全持重的象征。

(4)“律己成人”。“克己”被孔子看成“复礼”的前提,一方面,对自己严格要求,时常反省自我,是孔子对“君子”人格的一种规定;另一方面,“成人”是说对他人要真诚相待,成人之美。对他人不了解自己(即使自己大名鼎鼎),也不在意,所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所谓“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论语·卫灵公》)。对缺点、错误,“君子”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敢于承担错误,敢于解剖自己,所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论语·尧曰》)。对他人之事,由善处想,成全他人,所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对不同意见,不排除异己,要和而同之,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不断升华自我,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所谓“是以君子恶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总之,“律己成人”是君子言行处事又一基本规定,“君子”在此是自省宽厚的象征。

(5)“恪守气节”。君子要有气节,穷困不坠,富贵不淫,大义凛然,弘扬精神。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伯夷、叔齐两兄弟以食周粮食而可耻，饿死于阴山，孔子对其气节大加赞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君子”不可辱，可辱非“君子”，所谓“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可见，对“气质”的持守与执着是“君子”人格的又一基本规定。由此“君子”又是正气的象征。

（6）“慎言敏行”。“慎言”就是要求说话谨慎，周全措辞，更不恶语伤人，所谓“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敏行”则要求遇事机警，行为果断，所谓“（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里仁》）。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说话周全不苟，行为灵敏有功，是君子人格又一基本规定。“君子”在此是言行一致的象征。

（7）“遵礼守法”。这里的“法”不是韩非子之“法”，而是与孔子之“礼”相应的社会规范或约定。讲究礼法，无有争夺，有争者为射箭比赛，而射箭比赛也有“射礼”，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为政》）思考问题不应超出自己的身份，所谓“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总之，“礼”是君子行为的准则，不应越礼而动而听而言而视，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所谓“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所谓“约之以礼”（《论语·公冶长》）。“君子”在此为遵礼守法的象征。

（8）“自强不息”。自强、自力、奋斗不止，挺立生命是君子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求学要有忘我的精神，所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弘扬道德要时刻准备牺牲的勇气，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践仁履义也要饱满精神，知难而进，所谓“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忧苦面前不埋怨，怀着高昂热情，百折不挠，奋斗不止，这就是“君子”的自强不息。“君子”在此是生命勃发向上的象征。

“以义为质”，“关怀意识”，“中庸不偏”，“律己成人”，“恪守气节”，

“慎言敏行”，“遵礼守法”，“自强不息”，这就是孔子“君子”人格的主要内涵。在《论语》中我们还发现，为了使“君子”人格易把握，易操作，孔子对“君子”人格进行过一些言简意赅的概括。

君子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君子三戒：少戒色，壮戒斗，老戒得。（《论语·季氏》）

君子四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

君子四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

所谓“九思”，意味着成为“君子”者，无论何地何时都要对自己的各种行为进行监督与反省，与“君子”人格的“慎言敏行”，“遵礼守法”对应。所谓“三畏”“天命”，实为主谓结构，即天命令、安排之意，“君子”当然“畏”，故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说；“大人”是指居高位之人，这种“大人”一般被认为秉承了天的意志，因为由君子人格内涵看，“君子”绝不会畏无德无智之“大人”；“圣人”实际上是孔子时代不复存在的“大智大德”之人，有“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之说，“君子”对如此“圣人”当有一种敬畏之情。所谓“三戒”，则是要求为“君子”者，在生命历程的三个主要阶段应注意的修养。所谓“四恶”，“恶称人之恶者”与“律己成人”之品格相对；“恶居下流而讪上者”与“遵礼守法”之品格相对；“恶勇而无礼者”与“以义为质”之德相对；“恶果敢而窒者”与“慎言敏行”之品格相对。所谓“四道”正体现了“敏行”、“遵礼”、“关怀”、“尚义”之“君子”人格内涵。可见，孔子的如上概括，正是成为“君子”之人的操作指导。由上可知，“君子”实乃孔子基于那个时代而建构的一种理想人格；“君子”人格既涵具了孔子以前人格智慧，也是孔子时代一般人格的升华，由此生出一种激励人们成为“君子”的普遍意义与精神。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所谓“君子笃于亲，则民兴



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君子人格之检讨

“君子”人格具有丰富的内涵，如何开掘出其积极意义，将“君子”人格积极内涵转换为培养现代理想人格的道德资源，正是本文宗旨所在。

（1）学理价值。人所共知，“人格”的建构在中国道德史上从来就是一项重要课题。董仲舒企图塑造一种“与天相配”的道德人格；玄学家则试图建构一种“内儒外道”的人格；理学家企图培养“道问学”之人格；心学家则尝试陶铸“尊德性”之人格；近代思想家受到西方近代道德学说影响，努力于“自由、民主”之人格的建构。所有这些人格建设的努力，不仅在形式上（即努力构造一种理想人格），即便在内容上（即倾向于人的道德品性）都明显地深受孔子“君子”人格思想的影响。由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君子”人格论确实成为我国伦理学说史上“理想人格”建构的发端处。而且，孔子“君子”人格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一定的理论结构，已成为一种较完整的“人格”学说，这对今天如何建立现代人格学说具有重大启迪。

（2）意义的双重性，“君子”人格经由孔子的创建，成为人格学说的雏形，其对现实人格的培养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意义。可由三向度分析。整体上看，“君子”人格基本上属于道德人格。对人格的体、智、美方面缺乏要求，不仅导致现实中人格的不健康、不全面，如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格都局限在道德人格方面；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文化发展等方面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如过分讲究道德而拙于竞争，精神文化的发达与物质文化的相对落后。个别地看，“尚义”“关怀”“守礼”“律己”“高昂气节”“自强不息”，都具明显的积极价值；“见利思义”“关怀众生”“遵纪守法”“约束自律”“恪守气节”“自强不息”，难道不是任何个人都应具备的起码品性吗？但“中庸不偏”“慎言敏行”在积极意义下隐藏着负面的因素：“中庸”即反对走向极端，然而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一端，否则进步、发展将不再有必要。因此，“中庸不偏”在性格上容易使人走向保守、犹豫、寡断；在现实上则可能阻碍社会的进步。“慎言敏行”，处处慎言，出口顾虑太多，这就可能造就看脸行事，假话真说的圆

滑人格。具体看,“君子”人格在塑造现代人格方面显然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毕竟是立足当时社会现状升华出的要求,也就是说,“君子”人格所表现的具体内容含有某些需要克服的局限性。如“遵礼”之“礼”,即是孔子持守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格的等级关系以及其他服务当时社会制度的道德规范,如此之“礼”于今天显然无多大积极意义。这意味着对“君子”人格内涵要进行创造性转换。

(3) 现代价值。“君子”人格具有现代价值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①它何方面表现为现代价值?②实现“君子”人格现代价值的途径在哪里?先谈第一个问题。“君子”人格要求以“义”的手段获取富贵功名,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不劳而获,损公肥私,杀人越货,贪污腐化,谋财害命等现象似乎已习以为常。干这些勾当的人能否考虑一下他们行为的“义”在何处呢?每个人都有权力获取正当的“利”,“义”正是保护这种权力的条件。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确实需要每个人将“以义为质”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君子”人格要求“遵礼守法”,现在国家制定的法律并不少,各行各业的规章也应有尽有,可是纸上的秩序就是不能反映到现实中来,某些人知法犯法,置法于脑后。平心而论,法规的制定实为了协调人人关系,促进工作顺利进行,人人应懂得违法、践踏法规虽然可以给个人以短期的爽快和利益,但无疑是损人始,害己终。“君子”人格要求有“关怀意识”,这是人道精神的体现,人类本来一体于大宇宙。由自然到人类的演变实际上包含着人类宇宙一体的观念,“关怀意识”正是大宇宙胸怀在人精神上的延伸与提炼。孔子以“关怀意识”为“君子”人格基本因素,浸透着他对人类宇宙命运沉思的智慧。现代人在文化技术化、工具化、制度化的背景下,破坏意识、人情淡漠、天人错位等现象极为严重,也许静心体会一下“君子”人格“关怀意识”会有所醒悟。“君子”人格要求“律己成人”,这是对人品的一种升华,在人己利益冲突时,甚至不存在人己的利害关系时,他人需要你助一臂之力,“君子”应义无反顾地成人之美。对照“君子”人格,现实生活中那些利己害人者、视人遇险麻木不仁者、放任自我道德修养者,难道不该仔细体悟一下“律己成人”之圣训吗?“君子”人格要求“自强不息”,这是对人格生命的肯定与赞美,人生



命的弘扬与挺立，前提就是要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品格。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事实上，一己生命的价值与质量，确实把握在自己手中，你可庸庸碌碌，堕落不支，你也可以奋发图强、展现宏志，光彩生命，而这需有百折不挠的品格、不畏一切艰难的斗志。这种精神是否完全融入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液中呢？21世纪竞争将更加激烈，我们个人，我们民族能否挺立，能否富强，“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再谈第二个问题。“君子”人格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积极性内涵对我们培养理想的现代人格，将产生深远意义。但问题的关键是：第一，加强对“君子”人格的学术探讨。“君子”人格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道德教化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无力论及，但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君子”人格的全面认识与把握，而这是我们由“君子”人格导引出其对现代理想人格培养积极意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第二，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在全社会进行宣传，号召实践，进行监督，使“君子”人格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行为之中。否则，再好的人格象征也永远是“象征”，是镜中花水中月。第三，体制前提。“君子”人格已经是人格的一种提炼，而“君子”人格积极性因素是人格的再一次提炼。做个“君子”，体现“君子”人格，当然是高尚的事情，但“君子”人格是在实际处理己群、义利、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等关系中凸显示出来的，也就是说，“君子”人格的实现与高扬，不仅意味着单纯人格的重建，更意味着相应社会条件的支援。

《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